

编辑例言

一、本套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商金林 (1)
南行杂记	(1)
长安道上	(50)
朝山记琐	(81)
丽芒湖(节选)	(92)
自巴黎西行	(161)
哭鲁迅先生	(193)
记顾仲雍	(204)
亲送《语丝》记	(207)
《语丝》的文体	(209)
读书与求学	(211)

孙伏园散文选集

红叶	(216)
绍兴东西	(220)
竖鼎	(224)
三弟手足	(228)
第一个阳历元旦	(233)
辛亥革命时代的青年服饰	(237)
吃粽子	(241)
重阳	(246)
考古与吊阴	(252)
金未伯集序	(258)
博野行	(264)

序 言

商金林

—

孙伏园在《三弟手足》、《药》、《辛亥革命时代青年服饰》、《记顾仲雍》、《哭鲁迅先生》等文篇写到青少年时代他“也曾到府山下去瞻礼过秋（瑾）先烈的白木棺材”，也曾在辛亥年参加“武装演说队”等生活片断。从1918年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的十年间，是孙伏园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1918年，孙伏园进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

动。这一年，他担任《国民公报》副刊的编辑，开始了“报人生涯”。《国民公报》停刊后，孙伏园于1920年7月转到《晨报》，最初编第七版“文艺栏”。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孙伏园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辞去北大的讲师之职，出任《晨报》专职编辑。10月12日，孙伏园接替李大钊所编的《晨报》第七版“文艺栏”，并将该栏改为四版单张，定名为《晨报附刊》，由孙伏园主编。我国报纸有副刊性质的文字甚早，但不一定作为专页，不称之谓副刊。“副刊”二字首先见诸报端的，当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附刊》。在鲁迅等先驱者的提携和帮助下，孙伏园锐意革新，将《晨报附刊》办成一种兼收并蓄，为文艺界所瞩目的综合性副刊，介绍新思想，刊载新文学作品。1922年5月5日，《晨报附刊》发刊了“马克思纪念”专辑；同年11月7日，发刊了“俄国革命纪念”专辑，开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风气之先。“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晨报附刊》上发表过作品或译作，世界许多著名作家也被介绍在报端。《晨报附刊》成了新文学

茁壮的园地，成了勾通中外文化的窗口。孙伏园以“反叛封建”和建设新文化的双重姿态活跃在文坛上，名声大噪。

1924年10月的某一天，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经孙伏园之手编入《晨报附刊》，在见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到报馆看大样时，发现鲁迅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孙伏园气愤极了，第二天，孙伏园便辞去了《晨报附刊》的编辑，“以示抗议”。这位“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离开《晨报附刊》之后，深感“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在鲁迅的竭力支持下，于1924年11月17日创办了《语丝》周刊倡导“语丝文体”，成了我国“小品文的发祥地”（汪侗语）。1924年12月5日，《京报副刊》创刊，孙伏园应《京报》总编辑邵飘萍的邀请，担任副刊主编，将《京报副刊》办成了“新进作家”文学艺术与学术思想的活跃的园地。鲁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译著多达40余篇。“五卅”运动期间，《京报副刊》前后开辟了“上海惨剧特刊”，“沪汉后援专刊”，“救国特刊”，“反抗英日强权专刊”，“‘北大学生军号’专

刊”，传播反帝爱国思想。1926年4月24日，《京报》被奉系军阀查封，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是孙伏园来到厦门大学，后因受厦大“正人君子们”的排斥，前往“给人的希望更多”的广州，担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并兼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1927年2月，孙伏园应邀赴武汉担任武汉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副刊总编辑。他从广州出发，由一队黄埔军校毕业生护送，徒步去武汉，途中亲眼目睹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深受鼓舞。到武汉后，孙伏园看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觉得很好，就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全文发表了。他还在《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女作家谢冰莹的成名作《女兵自传》，被文学界誉为“编辑能手”。在“武汉政府”时代，孙伏园联络当年在武汉的文化人林语堂（编辑英文《中央日报》）、沈雁冰（主编汉口《民国日报》）、蒋光慈、顾仲起（主编《血花世界》）等，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办了“上游”文艺周刊，藉以表明他们这些文化人到武汉后都有置身于革命“上游”的亢奋。

二

1927年10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伏园游记》（李小峰辑集，蔡元培题签），汇集了作者早年写的四篇游记：《南行杂记》（1920年9月），《从北京到北京——两星期旅行中的小杂感》（1922年7月），《长安道上》（1924年7月），《朝山记琐》（1925年5月）。作者是绍兴人，却口口声声称北京是他的“家”，对北京满怀深情，这四篇游记，都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南行杂记》写的是从北京到绍兴看望母亲，旅途横跨皖、苏、沪、杭，往返四十余天中的见闻，观察和感想。“因为保存他的本色，有许多地方索性照著感想时录出，并没有修改”，堪称中国社会一鳞半爪的写照。阶级压迫的惨酷，后母虐待孩子，母亲重男轻女等种种恶习令人震惊；淮河汛溢，上海大遭飓风之灾的惨象令人目不忍睹。大自然凶暴地杀伐人类，以及人间同类相残的“战氛”，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旧中国“末世”的图景。这篇游记中的《故乡给我的印象》和《浦

镇十三日之勾留》两章，将老中国儿女们的愚昧卑微写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别的作家的游记是在“绘图”，那么孙伏园的游记则多是在透视。在《南行杂记》中，在写到津浦路上的固镇、新桥等地的大水时，说：“遇见天灾，人也会和草木一样的挣扎，我看了觉得有生之物对于生命都具有同样的热诚。但我所不满意的，人之所以异于草木鸟兽，是在他对于自然，除肉体以外，还能用精神挣扎，除自己以外，还能为他人挣扎。”其理尽在其中了。

《从北京到北京——两星期旅行中的小杂感》，写的是作者到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会年会期间的所见所感。虽然也写到登临泰山，曲阜谒圣，但重心是记人。这篇游记通篇都是切切实实的叙述，可以当作杂感来品味。在山东滞留期间，作者反对同学柳君“逛山东窑子”，用“嫖妓一面固然是侮辱他人，一面同时也侮辱自己”的“谬论”，冷却了柳君的“嫖妓之念”。乘轿子由轿夫抬着逛泰山时，心里“癖想”着对不起轿夫。谒孔墓时，不愿意“对着孔子的精神”折腰行礼，反封建，崇尚人权，倡导自由平等的思想溢于言表。

不难看出,1922年的孙伏园是一位急进的知识青年。

1924年7月,鲁迅、王桐令、陈定漠、陈钟凡、夏元璜等十多位教授应陕西教育厅及西北大学合组的暑期学校的邀请,赴西安讲学,鲁迅讲《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孙伏园以《晨报》记者的身份与鲁迅同行。孙伏园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写成给他老师周作人的一封长信——《长安道上》。西安是历史名城,孙伏园随鲁迅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藏经;到古董铺买石刻、拓片、造像、陶瓶、土偶人、弩机等古物,访幽探胜,抚今追昔。在西安滞留期间及往返途中,作者感慨最深的是兵荒马乱给晋、豫、陕等地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河南西部连年匪乱,满目枯槁;洛阳街上“只觉得跑来跑去的都是妓女”;陕西“因为连年兵荒,弄得活动的的能力几乎极微了”。“累代兵乱”把陕西人的民族都弄得“安静”、“沉默”、“和顺”了,“古迹当然也免不了这同样的灾厄”。作者同情人民的疾苦,对“赤裸裸一丝不挂”、勤劳、豪爽、健康的黄河船夫“钦佩到了极点”。他们终年在黄河上搏击,“知道短少”,

“精神”却是“健全的”。他们健康的“形体”，“真与希腊的雕像毫无二致”。作者是“唐代文化”的崇拜者，以较多的笔墨记叙了陕西各地敦厚纯朴的民风，“一种美的诗趣”的习俗。请看作者笔下的“陕西人”：

……易俗社的所以独立得住，原因还在于陕西人爱好戏剧的性习。西安城内，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较为旧式的秦腔戏园三，皮黄戏园一，票价也并不如何便宜，但总是满座的。楼上单售女座，也竟没有一间空厢，这是很奇特的。也许是陕西连年兵乱，人民不能安枕，自然养成了一种“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的人生观。不然，就是陕西人真正爱好戏剧了。

描写民风民俗最精彩的游记当推《朝山记琐》。1925年农历四月初八至初十，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委派，孙伏园、顾颉刚、容肇祖、容庚、庄尚严等一行五人，“去了洋服”、“套上黄布袋”，扮成“香客”，“沿路一概随

俗”，“跟着往妙峰山进香的人们”，去观赏妙峰山的香市，对妙峰山的信奉、庙会、幡会以及进香人的情况作详细的考察，“这是读书人接近劳动大众，了解他们生活的一次有意识的学术调查活动。妙峰山在京城西北八十余里，山路四十余里，共一百三十余里。山上有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庙。每届旧历四月初一开庙半月，朝山进香的人非常踊跃；尤其是初六初七初八三天，每天去的有好几万人。香客来自北京、天津、保定等地，他们不惜盘绕崎岖山路，进庙烧香以求神圣福祐。作者有闻必录，把京西妙峰山那个“上下行人不绝于途，灯火灿烂如繁星”，见来往人，凡上山者必互曰“虔诚！虔诚”；下山者必到花摊买“福”（“福”者“花”也），互曰“您带福还家！”的特异的社会写得维妙维肖。通篇游记偏重知识，文字潇洒，轻松幽默，是游记文学中的上乘之作，读者非至终篇不肯释手。

“信手写来”是孙伏园游记散文一个重要特点。他的笔调朴实平缓，庄谐交织；他的语言与行文轻松，没有藻饰与妙笔，只是明明白白讲最容易听懂的话；他的刻画，也只是借以表达自己

的感受、思索和见解。他的这种随意品评的风格，从下面的文字中即看出：

人谁不读孔子的书。故入孔子庙，谒孔子墓，而腰骨不酥酥的往软者，想来是很少的吧。但自己要软，一个人软也就算了，却偏要叫别人也跟着他们去软，我几乎要笑出来了。幸而周建君用极圆到的语调答复他们：“大家不妨自由行礼吧！你们行以后，我们再来行。”……

《15154 从北京到北京》

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惨遭杀害。为了摆脱思想上的苦闷，换换环境，孙伏园于1929年3月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

留法期间，有了“比较整段的工夫”，“可以静默的观察”，“细微的研究”，“游历的时间与空间

愈加扩大”，于是写了《在法国的乡村》、《自巴黎西行》、《丽芒湖》等游记，为我国现代游记文学增添了新的篇章。其中，《丽芒湖》最受读者称爱。

孙伏园写《丽芒湖》颇费心思，他蛰伏斗室，“对寒灯，抚短鬓”，精益求精。这篇长达四万字的游记，文笔细致飘逸，实如丽芒湖微风中的碧波，美不胜收；情、理、美交融辉映，引人入胜，令人产生无穷的回味。请看作者写他与怒安兄漫步法国圣祥哥尔旧城的一条溪流的文字吧：

穿过旧城市，我们来到溪流边了。……行人既没有第三个，离村宅至少也有半里路，所以除了流水的声音以外，只有间或树丛里漏出一二鸟语，空气是清静单纯到极点了。水的来路我们是知道的，但自桥以上，即被山石丛木遮住；水的去路我们更是知道的，但在我们视线以内不过数十步，以外也被山石丛木遮住了。只是这无头无尾的一段，好像戏剧的一幕，小说的一节似的，给与我们无限大的吸引力，谁也不征求谁的同意，两人默默的

在溪边岩石上坐下了。

我们无语。我们是各在想什么吗？我却
没有。我在忙乱的时候，极希望有一个清静
单纯的环境，让我好好的用一会思想。及至
真得到了这样的环境，我的思想却被环境擒
住，一丝一毫的作用也没有了。但我觉得我
极舒服，一种被擒住时的舒服。不是伟大，便
擒不住藐小；不是崇高，便擒不住卑下的；不
是永久的，便擒不住顷刻的。我的思想，也是
溪流一般的东西，但它不敢在溪流的面前显
丑么？不是不敢，它是甘愿的降服了。

我们无语。我们是因为溪流冲泻的声浪
太高而无语吗？我却不是。语言是怕对方不
了解，不得已而才用的。而语言却是极不完
美的东西，越解释越误会。为消除误会，最好
加以解释。为怕越解释越误会，最好是不解
释。但天下有极易了解的事情，有如这溪流，
永不会发生误会不误会的问题，也永不会发
生解释不解释的问题，要语言何用呢！

我们无语。我是因为羡慕溪旁的岩石而

无语。它亲眼看见千百年流水的潺潺，如果不是它，早骄矜得不可思议了，而它无语。它亲身遭受千百年人畜的践踏，如果不是它，早呼吁得不成样子，而它无语。处最活跃之旁而独安静默，处最朗澈之旁而独安黯浊。我的思想现在也许是在模拟它于万一了。

远远的一声雷响，引出各处山谷的回声，把我们如在梦中惊醒。

作者写的是“溪流”，抒发的却是对于宁静淡远的人生境界的向往之情。作者笔下的丽芒湖是美丽的，美中有情，情中寓理，情、理、美三者揉合在一起，这里的山山水水，风俗人情都成了“甜蜜”的象征。8月10日，作者和他的胞弟孙福熙行将告别相处了“十余朝暮”的丽芒湖的时候，那种依依惜别而又决然挥手而去，既厚重而又潇洒的感情，格外感人。作者写道：

我们在日内瓦梧桐树下计算过的几处地方都逛完了，我们应该与丽芒分别了，但我们

真是舍丽芒不掉。直到昨天晚上，我和三弟还发疯，两个人都说，“只要明天早上有阴雨，我们一定再住丽芒一日！”

今天一早便醒了，心上这样想，反正是阴雨，何不多睡一忽儿呢？

然而，太阳从窗门上进来，催促着我們了。太阳！这是理智，这是决断，这是勇敢！它叫我记得先前的计划，它叫我們实行梧桐树下的谈话，它叫我們觉悟离别的思念也许比朝暮的聚首更加美丽。

作者将“情”转化为“理”，用理性克制了感情上的激动，完成了一个感情领域中的螺旋式的飞跃，“离别”成了一种理性的“留恋”，成了一种理性的“珍惜”。这种优美的情思，在读者心里唤起了与作者相同的感悟，得到精神享受。夏艺圃说《丽芒湖》是“游记体文章的范本。”苏雪林对这篇游记尤为赏识，他在《孙福熙一派的散文》^①中说：

^① 刊《新文学》第1卷1号，1935年4月10日出版。